

# 崛起的中国

张 谦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 崛起的中国

张 谦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2000年·重庆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崛起的中国/张谦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0. 9

ISBN 7-5366-5056-6

I. 崛... II. 张... III. 崛起-的-中国  
IV. D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028 号

崛起的中国

张谦 著

责任编辑 张茗 周魏骝

整体策划 郭志明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政法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17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6-5056-6/D·217 定价: 24.50 元

## 序

中英香港回归大搏击刚刚尘埃落定，东南亚金融风暴又恶浪掀天。北约东扩撞击俄美中关系，科索沃又燃战争硝烟。经济全球化要中国作答，知识经济又挑战中华。法轮功兴风作浪，神州又岂容邪教逞狂。“两国论”遭致天怒人怨，“3.18台选”又起波涛。十四年“入世”征衣未解，西部大开发又吼声震天。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艰难前行，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上下求索，矢志不渝。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中国的崛起，乃历史必然，逆之者亡。

回首昨日的征程，笑谈风云变幻，我们心潮澎湃。脚踏今天的大地，指点江山社稷，我们继往开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崛起的中国，势不可挡！

# 目 录

<b>第一章 中英香港回归大搏击</b> .....	( 1 )
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	( 1 )
二、中英香港回归大搏击.....	( 18 )
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前景光明 .....	( 62 )
<b>第二章 北约东扩撞击俄美中</b> .....	( 86 )
一、北约东扩的由来.....	( 86 )
二、俄罗斯同西方在北约东扩上的激烈较量.....	( 96 )
三、北约东扩撞击俄美中关系 .....	( 109 )
<b>第三章 东南亚金融风暴震撼全球</b> .....	( 116 )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 .....	( 116 )
二、东南亚金融危机探源 .....	( 133 )
三、亡羊补牢尤未为晚 .....	( 135 )
<b>第四章 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安全</b> .....	( 147 )
一、经济全球化 .....	( 147 )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	( 158 )
三、中国对策思考 .....	( 172 )
<b>第五章 知识经济挑战中国</b> .....	( 186 )
一、知识与知识经济 .....	( 186 )
二、知识经济对中国的挑战 .....	( 203 )

---

三、中国面对知识经济的作为 .....	(214)
<b>第六章 科索沃——强权与公理的较量</b> .....	(232)
一、人权旗子，强权实质 .....	(232)
二、搞强权不得人心 .....	(241)
三、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评析 .....	(256)
<b>第七章 神州岂容邪教狂</b> .....	(270)
一、痴迷“法轮”祸无穷 .....	(270)
二、剥去“法轮功”外衣 .....	(277)
三、神州不容邪教狂 .....	(287)
<b>第八章 天怒人怨“两国论”</b> .....	(299)
一、“两国论”的要害与实质 .....	(299)
二、“两国论”与史不符、于法不合，情理难容 .....	(305)
三、中国统一乃历史之必然，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	(311)
<b>第九章 中国“入世”风云</b> .....	(327)
一、中国“复关”、“入世”问题的由来 .....	(327)
二、风云变幻十四年 .....	(335)
三、面对“入世”的冲击和影响 .....	(347)
<b>第十章 走向新世纪的西部大开发</b> .....	(363)
一、认识西部大开发 .....	(363)
二、西部大开发五大战略重点分析 .....	(371)
三、西部大开发大有可为 .....	(379)
<b>后 记</b> .....	(397)

## 第一章 中英香港回归大搏击

### 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

#### (一) 英国殖民强盗掠香港

1、英国殖民主义者分三步强占、强割、强租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军队就不断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清政府妥协。1841年1月25日，英军在香港岛强行登陆。1842年8月29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强行割占了中国的香港岛。这是英国侵占香港的第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60年3月18日，英国军队又强占了九龙半岛南端。1860年10月24日，英国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的九龙尖沙嘴、旺角地区，连同小岛昂船洲。这是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第二步。

中日甲午战争后，趁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之机，英国又趁火打劫，向清朝政府提出拓展九龙界址的要求。它们以租借为名，强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又签订了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取得了中国广东新安县以南九龙半岛的大块腹地，租期99年。这是第三步。

从1841年1月英军强行登陆香港到1898年6月强租新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57年的时间里，用武力完成了对中国香港地区的

占领。

2. 关于新界问题。新界是指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周围 235 个岛屿、面积达 975 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土地。“新界”源自英文 New Territories,意即新的领土,这是英国殖民者给它取的名字。在英国租借之前,该地区有居民约 10 万人,聚居在 423 个村庄,隶属于广东省新安县九龙巡检司。“新界”在当时是清朝政府的重要海防要地,清朝政府在此设有大鹏协师副将,驻扎九龙城,统率重兵,据以防守。

“新界”毗邻香港,早就是贪婪的英国殖民者所垂涎的目标。英国割九龙半岛南端后不久,香港的英国官员就提出在扼守海港东部入口的鲤鱼门设立炮台。此后,香港英国军事当局多次叫嚣要扩展香港的领土。1894 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朝政府节节败退。港英当局认为有机可乘,向英国政府明确提出展拓香港界址问题。香港英国军界、商界此时也闻风而动,纷纷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起初,在英国政府内部,尤以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一些人,出于保持英国在华既得利益的考虑,担心如果英国展拓香港界址,会引发列强效尤,反而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因而,对于香港拓界一事,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清政府的甲午战败及随之而来的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英国政府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香港扩界计划就在此背景下开始付诸实施。

1898 年 3 月 19 日,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文中所提及的外国官员均用其中文译音,下同)向清朝政府提出警告:租借广州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列强提出同样的要求。1898 年 4 月 2 日,窦纳乐正式向清朝政府总理衙门提出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在英国的威逼下,软弱的清朝政府不敢拒绝英国在香港扩界的要求,只是提出拓界应限制在尽可



能小的范围之内。在征询香港英国军方的意见后,1898年4月26日,英国政府外交部指示窦纳乐为陆海军防御考虑,租借深圳湾至大鹏湾一线以南的所有领土,包括两湾的水域及邻近的岛屿在内。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清朝政府未作抵抗,便答应了英方所提出的在香港扩大所占的土地面积及租借期等多项要求,只是坚持保留中国官员对九龙的管辖权。

1898年6月9日,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签订。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从清朝政府手中攫取到了九龙界限街以北、大鹏湾和深圳湾一线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和附近大小岛屿235个以及大鹏湾、深圳湾水域的租借权,自1898年7月1日起“开办施行”,租期为99年。《专条》签订后,港英当局派辅政司骆克同中方所派专员补用道王存善于次年3月对新界界址进行了会勘,拟定了界址的走向。由于“新界”人民的奋勇抵抗,英国只能凭借武力才在1899年4月16日完成了对新界的接管。

### (二) 收复香港,收而不复、屡争屡败,这是一个半世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

1. 清朝时期。英军强占香港以后不久,不少爱国人士和官员就强烈提出了收复香港的主张。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行侵占了香港岛。2月1日,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和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即联名贴出布告,谎称已与清朝政府钦差大臣琦善“成立协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统治”。香港居民立即表示反对。据历史资料记载:“香港绅民以不愿为夷,联名控诸抚院。”内地的一些官员及爱国人士也行动起来。当时林则徐被革职尚留在广东,他对英军侵占香港岛“闻而发指,劝怡良(广东巡抚)实奏”,并且说:“人民土地皆君职,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在林则徐的鼓励下,1841年2月11日,怡良向道光皇帝揭

发了琦善“让给土地人民”之罪。1841年2月21日，东莞籍绅士邓淳在郡学召集会议，拟定呈文说：“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他们结队前往督府请愿。琦善竟恐吓说：“款夷出自上意，而诸君未识情形，争执如是，早晚祸及，……”请愿绅士未被压服，一些进士与琦善一直辩论到太阳偏西。邓淳等还联名上书怡良，指出丢失香港的严重后果：“倘或聚徒蚁穴，窥近虎门，将水陆大费张罗，斯省会岂能安枕。”表达了“白叟黄童，群思敌忾，耕氓贩竖，共切同仇”的心情，要求怡良“为国宣猷，为民除害”，“顺輿情以挾伐”。怡良等见到呈文后表示“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这场斗争造成了反对割让香港、要求收复香港的强大舆论，打击了琦善的卖国投降活动，是琦善始终不敢与义律签署条约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收复香港的呼声。爱国官员裕谦主张招募广东水勇“攻剿香港”。广西巡抚梁章钜也主张“认真团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双目失明的爱国知识分子张杓在《陈善后事宜》的呈文中说：“又闻有乡人愿先收复香港，功成后补给口粮者。特无人号召之，匿不肯出。”1841年秋冬，英军北上进犯闽浙期间，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水勇头人林福祥上书两广总督，义正词严地宣称“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他主张趁英军北上“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并自告奋勇说：“祥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清朝政府还是主张收复香港的。1841年广州战役后，道光皇帝一再命令靖逆将军奕山说：“香港地方，岂容给与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须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此后多次命令“相机攻克香港”。直到1842年5月，他还说：“香港地方，岂容夷人据”，如已准备妥当，应该“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皇帝也曾命令钦差大

臣黄宗汉密筹“乘夷兵赴省之时，捣其香港巢穴”。但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经济技术落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失利，清朝封建统治者非但没能“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反而在强敌的淫威下，退让妥协，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先是被迫正式割让香港岛，继之被迫割让九龙，最后又被迫同意租借“新界”。

2. 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于1919年1月召开了一次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与会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了两项提案：第一项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归还租界、归还租借地等七点内容；第二项是取消“二十一条”。在归还租借地的要求中，明确地提到了新界。英国官员听说中国要求收回租借地，顿时紧张起来。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草拟了使租借地“中立化”或“国际化”的计划，作为对策。英国殖民地部和外交部联合反对退出新界。不过他们只是虚惊一场，因为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根本拒绝讨论中国的提案。1919年5月14日，巴黎和会主席克里孟梭在给中国外交总长的信件中说，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这次和会的职责，建议在国际联盟能行使职权时，提请其注意。

巴黎和会没有完全解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赃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再分割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顾维钧于1921年12月3日要求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形成的强大压力和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法国声称同意撤出广州湾，英国后来声称在集体交还租借地时会放弃威海卫，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还胶州湾。英国代表、枢密院大臣贝尔福在会上力图避开新界的问题。他说，新界应该由香港管理，“因为没有它，香港就完全无法防守”。在1921年12月7日的第13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反驳说，保留新界并不是保卫

香港的唯一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得到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支持，所以在华盛顿会议上，中英双方仅就新界问题进行过一次小小的交锋，就不了了之。

3.大革命时期。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在这以后的几年内，中国国内的反帝爱国浪潮不断高涨。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1925年6月19日又爆发了持续18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1月，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湖北、江西的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群众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面对这些疾风暴雨般的反帝爱国运动，英国当局坐立不安。香港总督金文泰竭力鼓吹合并新界。1926年1月，他在一封机密信中建议保住新界。一年之后，他在一份电报中又说，鉴于中国各地都有人在煽动收回一切租借地和租界，现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尽快使该租借地（指新界）永久化。万一英国最终不得不对中国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可以把割让新界作为事实上交还威海卫的补偿，或者作为“慷慨地”修改条约的补偿，或者以之作为重归旧好的条件。但是，驻华公使兰普森竭力反对。于是英国政府外交部决定按兵不动，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时候，金文泰受权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当内战的战火不幸在中国燃烧之际，英王陛下政府要全力保护香港及其大陆部分。他们绝对不会交出香港，不会以任何方式在英国统治的大陆的任何部分放弃或削弱其权利或权力。”

4.二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问题被重新提出。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新加坡、仰光先后失守，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为了拉拢蒋介石，1942年6月3日，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接见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时，曾经表示“随着日本战败，所有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均将归还中国。”但他没有说明香港是否包括在内。

1942年下半年，美国舆论开始谴责英国的殖民政策，质问英国为什么不把香港归还中国，不废除在华的治外法权。当年十月，英美两国同时开始与中国谈判，商讨废除治外法权，订立新约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在其拟定的中英新约草案中，列入了要求终止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条款，并提出“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国政府。”虽然国民党政府只是小心翼翼地提到新界问题，但仍然遭到英国方面的断然拒绝。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新界问题不属于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的讨论范围。当年12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谈判中说，英国不准备讨论新界问题。宋子文提出，中国公众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此次条约若不包括新界问题，就不能消除中英两国之间的误解。蒋介石则表示，条约内如不包括收回新界，他就不同意签字。谈判一度陷于僵局。但蒋介石最终决定对英妥协。1942年12月31日，宋子文通知薛穆说，中国政府同意不把新界的租借与新约混为一谈，但保留日后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这样，中英双方在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新约。

1943年底，国民党政府因前线吃紧，已经不大关心香港问题，而英国政府的态度却日趋强硬。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英国归还香港，邱吉尔态度强硬地说：只要他还是首相，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副首相艾德礼在回答议员提问时解释说：邱吉尔话的含意包括香港在内。与此同时，英国

努力争取与美国达成谅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态度也有变化。1944年9月,英美达成协议,战争胜利后,英国远东殖民地仍由英国决定处理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再次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1945年8月,蒋介石竟然声明:“中国对香港没有领土野心。”仅仅表示:新界问题“今后将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至此,国民党政府与英国关于收复香港的交涉便宣告结束。

可见:收复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中国人一个半世纪的期盼。但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国贫民弱,实力不强、独立不保,所以,从清朝到民国;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到国民党政权垮台,从道光皇帝“相机攻克香港”、“收复香港、以伸国威”的破产,到蒋介石在邱吉尔强权下的低头;从无数仁人志士“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抗争,到孙中山先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国人管理关税权”的呐喊;……150年的渴望、150年的抗争,最终只落得150年遗憾的厄运。

这,就是历史。

### (三) 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政策及香港的繁荣

#### 1. 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我国一贯主张既要考虑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到现实情况,采取积极务实的政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我国开始着手解决香港问题,为什么我国一等就是33年?这其中主要是因为:其一,建国后,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如果当时就采取武力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虽然完全可能,但却不明智,因为这样做不仅会延缓我国发展经济的步伐而且还会影响港、澳、台地区的稳定,不利于亚洲和

世界的和平,当然也就不利于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了;其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是内地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经济的大战略格局中,起着重要的窗口作用。留下香港这个桥梁、纽带和窗口,西方就因我不死,中国就有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这可谓是大智、大勇、大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我国的基本方针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在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政府除了致力于增进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外,也重视加强对西欧国家的工作。这一时期,香港作为中国外汇收益的重要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特殊桥梁,作用十分突出。

1963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问题”,对于这类问题,中国政府的立场是:香港、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对这一类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政府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初,中国政府代表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国对港、澳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1972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这样,就避免了香港、澳门问题国际化,排除了其他国家插手香港、澳门问题的可能性,为中国政府最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铺平了道路。

与上述政策相适应,我国对香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包括: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政策,不容许内地的一些作法波及香港,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以优惠的价格大量供应香港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的协助。这种供应即使是在我国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也从未中断过。这一切不仅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以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阶段是1979年以后,我国政府关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逐步形成“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并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全面展开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工作,最终成功地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国内发展的顺利推进和国际外交斗争的巨大成功,中国开始具备了在比较有利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解决国家和平统一问题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英国方面开始不断试探我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香港的中外投资者也以各种方式对香港的前途表示关心。这样,香港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香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向英国明确表示,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自此,拉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序幕。

### 2. 香港与内地天然的经济联系

早在殖民地初期,外国商人就在香港采购内地茶叶、丝绸、土



产,又从香港向内地贩卖鸦片、棉布等“洋货”。1911年九——广铁路通车,更大大加强了我国南部地区通过香港与海外的商品交流,从而形成了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地位。抗战初期和战后,内地一批工厂企业包括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香港,为香港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从政治上稳定香港,从经济上支持香港,使香港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期,利用世界经济的良好时机,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有力地推动了香港转口贸易、金融、房地产和旅游、航运等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香港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内地的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香港转口港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995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额达9871亿港元,比1978年增长了88.64倍(同期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只增长22.26倍),内地与香港贸易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9.1%提高到34.8%,而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则占香港转口贸易总值的88.5%。可以说,香港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对内地的贸易,特别是转口贸易的迅猛发展。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能够从第23位上升到第8位,没有内地与香港贸易的增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此外,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的激增及其带来相关的商务需求,不仅为香港10万多个贸易公司提供了大量的生意机会,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转型,而且香港也从内地转口贸易附加值中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95年内地通过香港转口至美国的产品价值2135.45亿港元。即使都按平均增值率计算,这一年,香港通过转口内地商品去美国所获得的附加增值,也达到610亿港元之多。可见,内地的转口贸易对香港的对外贸易和社